《國立臺灣大學建築與城鄉研究學報》
第十三期　民國九十五年三月　書評　第107～116頁
Journal of Building and Planning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NUMBER 13, Mar. 2006, REVIEW AND CRITICISM. pp. 107~116

評介歐門汀葛爾的《規劃理論》*：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跨界對話

戴伯芬**

A Criticism for Allmendinger's Planning Theory：Dialogues between Modernism and Postmodernism

by
Po-Fen Tai

摘　要

本文主要目的在引介與評論歐門汀葛爾的《規劃理論》一書。在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之際，歐氏從後實證主義的類型學觀點，重新討論現代主義的系統論與理性論、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新右派理論、實用主義、倡導論等諸學派，同時轉向後現代主義規劃與合作論的論述。本文一方面引介歐氏對於諸理論的介紹與批評，一方面對於他所提出的理論與架構進行評論。除了歐氏自省的類型學問題之外，本文認為他忽略了西方資本主義社會以外不同時、空所出現的社會主義與第三世界規劃理論與實務，同時也有意忽略女性主義規劃者對於規劃思維與實踐的反省，使本書流為西方英、美中心論、男性規劃菁英主導的規劃理論。

關鍵詞：規劃理論、後實證主義、現代性、後現代主義

ABSTRACT

This paper aims to introduce and comment Allmendinger's Planning Theory. Based on post-positivism, Allmendinger evaluates essential planning theories, including systems and rational theories of planning, Marxism and critical theory, new right planning, pragmatism, as well as advocate planning theory, and provides a prospect for postmodern planning and collaborative planning. There are three comments: shortcoming of typology, ignorance of planning theory and practice in Third World other than in West Capitalist society, and a criticism from feminism.

Keywords: planning theory, post-positivism, modernity, postmodernism

---

民國94年4月13日收稿；94年7月8日第一次修正；94年8月15日第二次修正；94年8月16日通過。
* Allmendinger, Philip (2002) Planning Theory, Palgrave, 1rd., 225 pages. £12.00.
** 中華大學景觀建築系副教授，Associate Professor, Landscape Architecture Department, Chung Hua University, Hsinchu, Taiwan, ROC. 住址：300 新竹市五福路二段707號，e-mail：tpofen@gmail.com
本文十分感謝三位審查者的意見以及悉心校稿，讓作者向來粗枝大葉的寫作過失得以更正。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規劃理論沈寂了許久，歐門汀葛爾(Philip Allmendinger)(註1)在千禧年之後連續出版了兩本規劃理論的專書，一是《後現代時期的規劃》(Planning in Postmodern Times, 2001)，二是《規劃理論》(Planning Theory, 2002)，企圖從規劃與理論、實務間對話重寫規劃理論。這兩本規劃理論專書的出版，為規劃理論提供了一個兼具歷史與空間向度的理論總覽，幾乎一網打盡影響深遠的重要規劃理論學派(獨漏女性主義的規劃理論)，包括系統論與理性論、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新右派理論、實用主義、倡導論、後現代主義規劃以及合作論等諸規劃理論的精要，建立了規劃理論的知識系譜，讓規劃學界的年輕世代可以按圖索驥，快速地回顧不同理論間的要旨與爭論。

本論文的目的即在引介歐門汀葛爾的規劃理論，藉此思索規劃理論在後現代思潮下的發展與可能性，作者一方面循歐氏的書寫脈絡來快速瀏覽西方規劃理論的發展精要；另一方面，也對歐門汀葛爾所提出的規劃理論進行討論與批評。本文的討論分為三部份，一是檢視歐氏的研究旨趣與意圖，了解本書的寫作進路；二是簡介歐門汀葛爾如何從後實證主義的類型學觀點，重新檢視過去不同學派的理論內容與發展趨勢；三是檢視歐氏對於後現代時期兩個規劃理論學派的討論，了解他如何在後現代主義中重建規劃理論；最後則是關於本書的一些評論與對規劃理論的展望。

一、重寫規劃理論的羊皮紙

規劃理論與社會變遷息息相關，也反應了不同年代的社會思潮。西方系統與理性規劃理論始於1960年代保守主義當道的英國，1970年社會運動風起雲湧之際馬克思主義也順勢崛起，1980年代新媒體與大眾流行文化風行，後現代主義的思潮逐漸席捲整個知識文化、人文科學與流行工業。歷經1970年程序理性論的論戰，1980年的馬克思主義與右派自由主義的交鋒，後現代主義以降，宣告普遍的科學理性年代已經結束，強調自由浮動的表徵與觀點的多樣性。這股後現代主義思潮對於規劃理論的衝擊是從根本的認識論與方法論開始，剝除理性主義下規劃理論的面具，也對於整個規劃理論產生革命性的震撼。

歐門汀葛爾受到英國城鎮與鄉村規劃實務訓練(BSc Town and Country Planning, Hons)，為具有證照的規劃師，也在蘇格蘭規劃援助管理委員會從事社區規劃等實務工作；之後進入牛津大學受到歐陸後現代主義思想的洗禮，就開始在後現代主義規劃理論與英國城鎮與鄉村規劃實務的對話中，重新反思規劃理論的問題。本書開宗明義，歐門汀葛爾即點明了該書的寫作目的有三：一是為了回應理論與實務間的斷裂；二是作者循規劃理論的典範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之際，重新梳理規劃理論的理論脈絡，利用類型學的概念來鋪陳整本書的章旨。最後歐氏提出他自己對於規劃理論的創見，引入時間與空間的因素來詮釋蘊生理論與實踐的歷史背景與地方脈絡，在後現代主義的洗禮下，他採取相對主義的看法，將理論置於不同時間和空間的背景來重讀理論。

首先，做為蘇格蘭的規劃理論兼實務工作者，歐門汀葛爾一直關注理論與實踐之間的斷裂與落差問題。在此歐門汀葛爾的實踐不僅包括規劃理論在論述上的實踐作用，更注意到規劃本身的專業實踐。面對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歐門汀葛爾的興趣在解釋規劃的理論與實務之間落差為何「必然」存在的理由。他反對從左派而來，視規劃是國家用以延續資本主義社會關係的機制，也抨擊右派自由主義學者的市場選擇論，認為理論與實務之間的落差是眾多理論在市場競爭的結果，轉而從規劃者的角色與規劃的組織體系來分析規劃在理論與實踐中的問題。歐氏認為規劃實踐是透過國家與國家相關的專業組織等高度科層化的功能體系來執行。一旦規劃專業循其他專業的路徑來建立專業本身、專業成員與政府部門的關係，規劃者、國家與專業團體之間即形成互惠關係的基礎。一方面，政府需要規劃者來支持、合法化政策；另一方面，規劃者與規劃專業團體需要獲得國家合法化專業知識與證照資格，來鞏固他們的專業主義以及附帶的地位與利益。這種規劃者、專業組織與國家三合一的體系，是規劃影響社會變遷的結構限制因子。然這並不意味規劃者完全沒有自主決定的能力，因為規劃者必須與專業團體協商，並遵循專業守則行事。歐門汀葛爾特別引用季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結構歷程化(structuration)概念，提供解決結構主義與意向主義的兩難困境(Allmendinger, 2002: 15-16)。季登斯視結構與作用者為一體之兩面，結構固然會影響行為的方式，但行為也有可能潛在地影響與重組結構，而規劃者在此即為兩難情境中的行動者，既受到國家與專業團體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的影響，也可能會影響國家決策與專業團體的立場。

關於規劃理論與實務落差問題的討論，其實自1960年代大衛多夫(Paul Davidoff)以降的倡導式規劃對於理性規劃學派即有不少批判與質疑，在規劃學界也已經累積了不少的討論(Friedmann, 1973; 1987)。然而如何從批判的立場轉向實踐的可能性，歐氏既沒有提供任何有效的方法(雖然在合作式規劃中試圖以哈柏瑪斯(Jürgen Habermas)的溝通理論來解決這個問題)，也無視於規劃理論學界既有的不同運動路線之議，像是傅里德曼(Friedmann, 1987)或柯斯特(Castells, 1983)以社區組織動員為基礎的激進式規劃，或者是克萊維(Krumholz, 1975)的「進步地方政府的社會創新運動」，以進入體制的規劃師角色來進行改革。歐氏的立場顯然是選擇回到規劃的理論層面來討論實踐的問題，而不是回應已出現的規劃實踐來討論理論的問題。

其次，在知識論上，歐門汀葛爾採取所謂科學相對觀的「後實證主義」立場，來面對規劃理論的典範移轉。所謂的後實證觀點是要求「從以因果推論為決策基礎轉向發現與確認意義」(Allmendinger，2002：28，原文引自Moore-Milroy，1991：182)。在此歐氏首先處理的是一個廣泛的社會科學真實建構的問題，存在於社會科學與自然科學的本質差異，歐氏從巴柏(Karl Popper)的否證論、孔恩(Thomas Kuhn)的典範理論，轉向後現代的「論述」與「敘事」。他引用文化研究學者傅柯(Michel Foucault)的「論述」、李歐塔(Jean-Francois Lyotard)的敘事看法來建構規劃理論的「真實」。傅柯(1969)界定論述「是一組述句，提供對於一個主題特定類型知識的語言表徵」。相對的，李歐塔認為科學所宣稱的客觀知識只不過是他所稱的「敘事」，科學本身具高度的敘事性，是包含價值與假設的「後設敘事」。歐氏借用這兩位後現代主義學者的觀點，認為規劃理論如同其他社會科學一樣，可以選擇與任意地召喚不同的論述或敘事來適用既予的情境，藉此批判權力是以科學的「真實」為名而取得合法性，並宣示科學凌駕於其他知識形式之上。

接著建立在對於法魯德(Andreas Faludi)的實質規劃與形式規劃區分，歐氏選擇泰勒(Nigel Taylor)的新類型學來進行理論佈局。法魯德的規劃實質與形式分類已支配了1980年代前的規劃理論，但歐氏認為這種二分式的簡單類型學已無法因應日益複雜的社會變遷，因為不論是形式或實質論都必須呈現出理解理論的方法而無法迴避事實與價值的問題。因而歐門汀葛爾以泰勒的新類型學為基礎，強調社會理論差異與哲學問題。泰勒的新類型學包括以下幾個原則(Allmendinger, 2002 :35-36)：

(一) 所有理論多少是規範性的，即充滿價值與鑲崁於社會與歷史脈絡；

(二) 既予的社會與歷史背景之應用或理論的使用，無法「解讀出」學科訓練或理論的教條所源生的抽象理解。因此，

(三) 理論是透過空間與時間中介，容許不同的詮釋與應用。

(四) 如果理論是規範性的，透過時間與空間而由社會和歷史中介變化，在實質與程序上就不再有分野，而是在理念與行動間複雜的反覆關係。

歐門汀葛爾認為新規劃類型學的路徑強調規劃理論規範性的面向，分析的焦點在規劃理論的源起與哲學基礎，闡明影響理論的社會原則，追循理論如何在不同時間與空間的背景下經由不同規劃方法轉介與使用，而不僅是虛構的實質與程序分野。在此，歐氏所稱的「後實證主義的類型學」已經是名符其實的後現代思考產物，直接引用後現代主義的敘事與論述來說明規劃理論的政治性。因此在重讀規劃理論之際，歐門汀葛爾不僅將我們拉回理論興起的時空脈絡，也為理論在後現代的思維中尋求可能的出路。不過這樣的討論只說明了歐氏本身為何採取類型學的方法，但似乎仍未清楚解釋他如何利用類型學來分析規劃理論。像是如何選擇這九種不同類型的「內生規劃理論」，是基於歐氏本身主觀的理論興趣，還是有外在客觀線性發展軌跡？是他自身對於規劃理論有意圖批判，還是僅循著一般社會理論流行的軌跡？歐氏在此似乎迴避了類型學中最重要的分類基礎問題，未能給讀者一個合理的交待。

最後，歐門汀葛爾認為時間與空間是理解規劃理論的關鍵。理論的基礎在不同時間與地方引起不同論述的可能性，因為歷史、文化、經濟和政治的視窗所看到的不同理論而引發不同的詮釋。歐氏在本書中特別著重規劃理論在不同地域的理論發展與實踐差異，像馬克思主義過去在蘇聯與歐洲即有不同地區的發展模式；而新右派在英國、美國、丹麥、荷蘭、比利時、加拿大與日本的政府政策有不同的實踐；實用論雖源於美國哲學，架構在美式的民主與自由主義之下，在

臺灣大學圖書館 期刊資料庫

英國卻形成對於組織運作與替代方案的思維；倡導論是由美國的大衛多夫所提出的，在美國由地方當局的規劃師與自願性團體推動，在英國卻形成國家體制化的規劃援助服務部門。不同時、空下的理論發展與實踐雖是歐門汀葛爾強調重寫規劃理論的目的之一，也是試圖在後現代主義虛無論中重建規劃理論的重要基石，不過歐氏實際在書寫規劃理論時卻很明顯地僅著眼英、美規劃理論與實務的比較與討論，忽略了其他不同地域的規劃理論發展，這點容後再述。

二、後現代主義思潮下的規劃理論

除了後現代主義與合作論兩個屬於後現代思潮下的新理論外，我們可以在歐門汀葛爾的寫作意圖下重讀規劃理論幾個重要的學派，包括：系統論、理性論、馬克思主義、新右派、實用主義、倡導論。歐氏以「後現代主義」洗禮後的社會科學方法論，重新來拆解與批判這些不同時期出現的「現代主義」理論，並與後現代主義與合作論進行對話，這些理論在後現代時期可能的轉變參見表一。以下簡要說明歐氏如何處理這些理論的主要論旨，以及重新詮釋這些「現代主義」下的理論如何在「後現代主義」中轉變。

(一)系統論與理性規劃論

規劃的系統論在1960年代中葉到晚期在英國興起，代表人物為麥克勞林(Brain McLoughlin)和喬德威克(George Chadwick)。規劃的系統論受到生物科學中的系統思考影響，強調1.自然與人類環境中所有領域皆存在著系統；2.系統可透過調節不同組成部份的溝通而被控制。系統論以數理模式為基礎而忽視系統規劃本質做為政治工具的危險，招致不少後進理論的批評。歐門汀葛爾在此特別關注系統論對於規劃的態度以及預測與模式化方法(Allmendinger, 2002: 46)。歐門汀葛爾同意法魯德等人對於系統論的批評，認為系統論一方面無法處理國家等錯綜複雜的政治社會機制，另一方面未解決專業者的合法性問題。但是歐氏在質疑規劃做為社會控制方法之餘，也不忘標舉規劃對於計畫、模型等預測的需求，因而在重讀系統論時，歐氏特別指向1980年代晚期出現的複雜性系統論，特別是混沌理論與複雜理論。複雜性系統論強調相互的直觀、非因果行為、經由持續與變化的回饋之適應行為、權力的分散、非化約論、部份無法導出整體，這些原則使系統論在方法論上更趨向後現代主義的思維。

理性論以法魯德(Faludi Andreas)為代表，他認為規劃是達成最佳結果的方法，並提出規劃理論的形式與實質的類型，對於後來規劃理論有重大的影響。為了達成結果，規劃者必須像從事研究的科學家一樣在眾多的手段與目的之間尋找最好的方法。規劃者只是以有效的方法界定與解決問題的簡單科層體系，為了從大量的資訊與不同的觀點中決策，必須用理性的指標來評斷要採取什麼行動。歐門汀葛爾對於理性規劃的批評主要有三點：首先是理性規劃過度簡單化社會背景中的規劃與規劃者所持的理論間真實互動，以及規劃實踐的內在過程。第二個批評主要來自馬克思主義，認為理性規劃沒有提供任何批判社會或資本主義的看法，而是與主導經濟力量同流合污。最後的一個批評則來自溝通學派理論，認為理性規劃分離了手段與目的，透過重建溝通理性，應將專業的技術理性當做溝通工具而非目的本身(Allmendinger, 2002: 62-63)。

歐氏認為系統論與理性論是實證主義規劃理論的極致，也循其他規劃理論的腳步，特別是左派馬克思主義者對於國家與專業者間角色的質疑來進行批判。但是站在實務工作者的立場，歐門汀葛爾並未採取馬克思主義或部份後現代主義學者的立場，全然否定規劃存在的必要性，而是認為系統論與理性論仍提供了規劃實踐必要的手段：預測與控制的工具。歐氏認為複雜性系統論的出現，正是以更精確的模型提供對更複雜真實世界變化預測的可能性，而溝通理論由下而上的參與式民主與溝通論則可以彌補理性論政治立場過於保守的問題。

(二)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

馬克思主義理論認為都市領域和規劃不能與社會分離，城市規劃和規劃理論是對資本主義的反應，同時也是資本主義的構成要素。歐門汀葛爾先引用葛蘭西(Anthony Gramsci)支配權(hegemony)的概念來解釋為何馬克思主義預言的資本主義革命沒有出現，是因為統治階級必須以自身的道德、政治與文化價值來建構共同意識。國家也就無法僅是一種外在強加於被統治者意志的工具，也須有被統治者的合議才能成立，因此預期的資本主義革命並未發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歐門汀葛爾雖然同意馬克思主義的觀點，認為在隱而不顯但正當化了國家角色的意識形態下，規劃是國家統治的工具，提供干預的藉口與公共利益的偽裝，但並非真正的公共利益。規劃可能支持資本主義，說服人們規劃代表他們的公共利益，實際上只不過是有權勢者的利益外衣。但他同時也檢視了規劃者的角色與價值觀，引渡「批判的實用主義」，鼓勵規劃者做一個「反身性的實踐者」（Allmendinger, 2002: 88-89），而不僅是流於資本主義國家的附庸或與資本主義的對立和反抗。在此，歐氏並未進一步去處理之前作者所提出的不同規劃路線實踐問題。

而歐門汀葛爾對於馬克思主義為首的政治經濟學派之批評如同其他理論，或馬克思主義本身對於古典馬克思主義的批評一樣，主要集中於化約主義，更加強調階級衝突以外其他社會對立面所造成的社會變遷。在此，歐氏以批判理論來引領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走向文化馬克思主義以及文化研究。馬克思主義以降的批判理論既反對資本主義，也反對蘇聯形式的社會主義。像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都反對教條的馬克思主義、官僚主義，而試圖回歸到青年馬克思主義，關注個人自由與解放。而布西亞更將批判的焦點放在資本主義的文化面向，討論資本主義導致技術的剝削、「真實」（authenticity）之死，以及擬像（simulacra）的替代性，轉而不再支持任何的真實。對於歐氏而言，馬克思主義的社會理論，特別是國家的角色仍有重要的影響，不過他將後續的社會實踐由階級衝突的批判轉向了哈柏瑪斯的溝通理論，此與他一直強調規劃的實務面向而非批判面向有關，確實也避免了教條式馬克思主義當前所面臨的國家集體規劃困境。

（三）新右派理論

新右派視規劃為啟蒙時期以來懷抱的更好社會希望與信念，關於市場機制、個人自由和國家角色已廣泛地應用到公共政策的理論與實務。歐門汀葛爾認為由於政治上的優勢，新右派可以透過土地使用規劃來測試不同的市場理論，也在不同地域呈現出不同的地域政治差異。雖然新右派理論眾多紛歧，包含了公共選擇論、自由主義、獨裁主義以及保守主義等不同的理論學派，歐氏則簡單區分了自由論與保守主義兩種新右派理論。新右派理論認為規劃並不是自由企業社會的自然本質，需要人們干預市場的委任契約。如海耶克（Hayek, 1944）一方面認同市場的不完美，政府與國家的干預應扮演矯正市場的角色，像是確保法律規則的維持、提供基礎設施和國防，以及做為紛爭的仲裁者；另一方面又標舉市場和市場機制來分配資源，認為透過國家機器創造的自由選擇會干擾市場、減少個人的自由與侵蝕法律的原則。歐氏認為海耶克和其他自由派的哲學家都同意需要某種形式干預都市土地市場，但對於干預機制所欲達成的目的則無共識，因而形成保守派與自由派不同的看法。保守派立場是為了修正自由市場缺陷，重視強勢政府、社會極權、規訓的社會、層級與服從。而自由派的立場則是要求去除管制，強調個人的自由選擇、市場安全與最小的政府。

在實務上，歐門汀葛爾則進一步從新右派的理論基礎提出三種對於土地使用管制替代方案的一般性原則：法律原則、集中主義以及市場取向（Allmendinger, 2002: 106）。即使對於土地使用有不同的市場管制原則，歐門汀葛爾特別以英國的簡單規劃分區（SPZs, Simple Planning Zones）為例，強調規劃的土地管制機制其實是政治過程而非理性規劃的結果。

雖然新右派理論備受爭議，不過隨著環境問題的惡化，新右派理論，如公共選擇論、環境經濟學對於環境成本外部化，像是污染、噪音和都市生活等對於環境政策仍有重要的啟發。事實上，隨著全球化經濟的發展，國家角色弱化與解除土地管制已形成目前重要的區域與都市政策主流，只是真實世界並不是循著新右派的理論模型運作，而是政治化的過程，這也是歐門汀葛爾在規劃實務中得到的深刻體認。

（四）實用主義

實用主義顧名思義，主張經驗而非理論才是真實的裁判，規劃的解答是對於真正的問題管用。實用主義源於美國杜威的哲學觀點，在1980年代形成英國規劃的主題。杜威的實用主義著重自由主義與科學的方法，自由主義提供適於實用主義的政治與社會框架，而科學方法強調持續的批判和反身思考。關於科學方法的使用被歐門汀葛爾批評為提供「專家統治」的基礎，無視科學方法入侵政治與社會的領域。

歐氏認為實用主義所架構的自由主義基本的大綱，與後現代主義、合作主義間有一些相似性與差異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關於後現代主義中的實用主義哲學可以用兩個基本的原則來達成：以自由主義做為爭辯與討論發生的場域，以多元主義做為競爭理念與理論的原則。實用主義引介了自由的基本原則，具有後現代主義強調無法衡量性的特質，拒絕一種「共識」的觀點，採相對主義來接受不同的觀念與意見；如同合作主義規劃強調溝通，實用主義也重視語言與討論。然而與後現代主義相左之處在於實用主義提供一個基於「共享問題與共同目標」的方法。歐氏引用發瑞斯德(Forester, 1989)的「批判的實用主義」來解決實用主義忽略現實社會不平等的難題，結合實用主義與哈柏瑪斯的溝通理性，讓規劃實務不流於再生產不平等關係，而是加入規範性的面向，令規劃過程更加開放、民主，打開規劃更多元的聲音與意見。

(五)倡導論

美國的規劃者大衛多夫提出規劃者是倡導者的角色，認為規劃者應該能以身為政府與團體、組織或個人利益的倡導者身份加入政治過程，對社區未來發展提出政策。歐氏對於大衛多夫的批評主要來自兩方面，一是對於倡導性規劃如何實踐的問題，包括如何選擇替選方案、規劃組織類型、規劃者與業主的關係以及規劃與國家法治等，有很多規劃真實的議題是大衛多夫未能進一步深究的；二是從馬克思主義而來的批評，更深刻地點出規劃者缺乏對於自身專業與專業組織形成的自我批判，經常是掩蓋了規劃者對於被規劃者間的權力關係，特別是國家與規劃體制間的共生互利關係。

歐氏對於規劃做為專業的權力形成過程是來自前述的紀登斯結構與作用者的兩難，他一方面批判規劃與體制之間有種共生互利的關係，但又同時肯定規劃者本身具有由下而上的社區培力潛力(參見Allmendinger, 2002: 93圖7-1)。隨著規劃過程對於公眾參與採取更加鼓勵與開放的態度，倡導式的規劃有潛力可以連結到多元主義的規劃觀。不過相較於美國帶有價值判斷、獨立於國家體制之外的倡導規劃師而言，

表1　從現代主義轉向後現代主義的規劃理論

規劃學派	現代主義	後現代主義的轉向
系統論	1960年代英國，代表人物麥克勞林(Brain McLoughlin, 1969)和喬德威克(George Chadwick) 規劃是技術的決策，基於理性的效益	混沌理論與複雜理論 關於複雜的自然與人文適應系統
理性論	1940年代，芝加哥學派，代表人物為法魯德(Faludi) 規劃是理性的過程	溝通學派的理性
馬克思主義	代表人物馬克思 規劃是國家的延伸用以維持資本主義的關係	葛蘭西式規劃詮釋 國家角色
批判理論	代表人物：阿多諾(Theodor Adorno)與馬庫色(Herbert Marcuse) 對於社會主義與官僚主義的批判，分析資本主義續存的原因	布西亞的消費主義
新右派理論	國家的最小干預主義 英國柴其爾主義、美國的雷根主義	環境與生態關懷 環境經濟學
實用主義	1980年代美國，美式的民主與自由主義 歐洲組織與替選方案	新實用主義、批判的實用主義 (自由主義＋溝通理論)
倡導論	以大衛多夫(Davidoff)為代表 規劃者應該以身為政府與團體、組織或個人利益的倡導者身份加入規劃的政治過程	多元主義 不同地域下的倡導式規劃制度

資料來源：作者整理自歐門汀葛爾的《規劃理論》一書。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在英國皇家城鎮規劃協會(RTPI, Royal Town Planning Institute)的規劃援助制度下(Planning Aid),納入科層體制的英國規劃師反而喪失了捍衛公共利益的角色,隱藏了現實多元政治地景下的權力不平等關係。這也是歐門汀葛爾之前強調的,理論在不同地域透過不同組織形式的實踐結果。

三、在後現代主義中重建未竟的現代性計畫

回歸到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的典範移轉,歐門汀葛爾在《規劃理論》與《後現代時期的規劃》一開始都問了所有後現代主義開場時一個老掉牙的問題:何謂後現代主義?也和一般理論者一樣從現代主義來思考後現代主義。現代性是啟蒙時代以來的自由思想,重要特質為永無止境、創新以及持續的進步(Allmendinger, 2002: 159)。建立在「製造差異」的基礎上,歐門汀葛爾認為後現代主義本身即是充滿歧異的,只能建立在反現代的基礎上,以反現代性的角度來質疑啟蒙時期以來的合法性,希望透過對於現代性的全面摧毀,代之以完全開放的價值觀,將研究旨趣轉為「製造差異」。像是李歐塔拒絕社會理論中過度扭曲的後設敘事,發展出抵抗共識的架構。而傅柯的作品揭發人們生活其間的社會規範與符號結構,想要打破統一與整體,搗毀既有的認同監獄與排他論述,鼓勵各式各樣的差異,累積抵抗的多元形式。布西亞則以「擬像」的概念說明在後現代的消費社會中,消費符號不僅替代真實,也損害真實,我們不再能分辨何謂真實。

後現代主義對於規劃的影響與其說是實務的,不如說是論述上的啟發,後現代主義對於規劃本身其實並沒有太大的興趣,因為主流的後現代思考認為規劃只是附加於社會的強制共識和權力關係,而後現代主義的主要目的正是在解構共識以及日常生活中各種隱而不顯的權力支配關係。歐氏認為現代性的問題不在於本身的理論而在於其實踐。對於後現代主義,他同時提供褒貶兩面不同的看法。一方面讚揚後現代主義開啟規劃的差異政治,另一方面反對後現代主義滑向相對主義與過度的虛無主義。歐氏的立場其實是比較接近實用主義的看法,一方面要避開現代性的工具主義與科層化理性,另一方面要避開後現代的虛無主義與反規劃傾向。

關於後現代規劃的可能性,歐門汀葛爾採取保留態度,雖然他提出了後現代規劃的兩種可能性,一是從後現代觀點去批評規劃,但同時提供後現代在規劃不足的基礎,像是「黑暗面向」的規劃可以揭露規劃對於現實的影響(Allmendinger, 2002: 172);二是強調後現代的規劃只是一種「提示或建議」,納入了索雅(Ed Soja)開放性的後現代規劃或桑德庫克(Leonie Sandercock)的差異、多元性(Allmendinger, 2002: 174-176)。

最後,在合作式規劃一章中,歐門汀葛爾選擇回到哈柏瑪斯的看法,不應放棄現代性的計畫,而是透過不同的思考與認知,以完成現代性未竟的計畫來取代,嚐試從溝通理性來回歸現代性。歐氏傾向以溝通理論來重建現代主義,但將規劃視為一溝通過程,強調規劃過程的產出在於計畫本身是不同「論述」的結果。歐氏引用哈莉(1993)的看法,認為規劃者應該扮演的是平衡規劃的意義系統、對話(論述)與參與者(論述社群)論述的角色。他也提供了實務界「為真實而規劃」(Planning for Real, PFR)來當作合作式規劃的實踐範例(Allmendinger, 2002: 204-205)。「為真實而規劃」是由吉柏森(Tony Gibson)在諾丁漢(Nottingham)大學「為鄰里單位變遷的教育」所發展出來的,建立在溝通規劃是一個參與過程之實踐基礎上。為避免落入之前溝通理性者的缺點,「為真實而規劃」保留公眾決定「開放的討論」、問題與議題「框架」的界定,而不全然由規劃者決定議程與議題。對於歐門汀葛爾這樣一個實務取向的理論家而言,現在的規劃雖然是反民主的、性別盲目的以及文化同質性的,但如果可以經由開放式的民主討論過程,在多元主義的年代,規劃仍充滿了創造多元種族、多元激進的差異社會與城市之可能性。

四、結語:反身性的批評與替代性場景

很少有一本討論理論的教科書像歐門汀葛爾一樣,在批評既有理論的缺失之餘,也不忘對本身的理論架構進行自我批判。當然就一本「教科書」而言,歐氏類型學的觀點確實提供了最佳的寫作方式,也容易達成歐氏一開始設定提供研究者快速回顧規劃理論的目標。但是面對不同的規劃理論,歐氏的寫作形式卻是跳躍而缺乏一個統合性與一致性的書寫架構。有些章節純

臺灣學術期刊資料庫

就規劃理論的哲學起源及社會理論來討論，像是系統論與理性論、馬克思主義與批判理論、實用主義與後現代規劃理論，而某些章節又落到規劃實務來討論，如新右派理論討論了英國的簡單規劃分區、倡導論分析了桑德蘭工業與勞工住宅區的改建、合作式規劃論提到了為真實的規劃。

歐門汀葛爾本身關於這本書的寫作有三個「反身性」的思考。第一是缺乏橫切面的主題，來串連看似獨立、實際上卻有不同交鋒的學派。第二是缺乏對於規劃者使用學派不同類型理論的討論，即一種歐氏所稱的外延的、架構性的社會理論。最後，歐氏承認他所援用的是類型學而過度簡化理論代表性。可惜的是歐氏並不像傅里德曼(1987)在《公共領域中的規劃》(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一樣，提供從不同哲學思考落到不同學科領域中不同規劃理論學者的圖譜，以致於讀者無法了解為什麼歐氏會討論這九個不同的規劃論學派？為什麼有些章節的規劃理論其實只是社會哲學或社會理論？又為何會選擇與分類特定學者的論點？像是哈柏瑪斯為何不歸於批判理論、溝通理論而是合作式理論？或者布西亞是屬於批判理論學者抑或是後現代主義論學者？

順著歐氏反身性的思考，有三點理論上的核心議題值得進一步深究。首先，關於以上歐氏所反省的三個問題的核心，其實是一種類型學方法論中經常可見的謬誤，即因過度致力於個別的理論類型建構，即有歐氏本身自明的缺乏不同理論間跨界對話，以及過度簡化理論問題。首先，不同時間不同的理論在學術界和實務界受到歡迎與否，其實不僅只是理論思潮的起伏更迭，也是不同理論學術論辯與對話的成果。1960年代的系統論，1970年代的馬克思主義，1980年代的新右派，1990年代的合作式規劃理論、實用主義論和後現代主義論，每一個理論的興起都像是廣闊知識海洋上的波浪，後一波的理論是建立在前一波理論的不足或應用於經驗上的修正。歐氏雖然反對以線性發展的觀點來看待不同理論的推展，卻花過少的篇幅來處理不同理論與經驗間的對話(唯一的對話是在於現代主義與後現代主義的學派分界)，因此無法向讀者交待理論發展的脈絡，而流於對個別理論的介紹與批評。再者，為了使個別理論能夠清楚地呈現，歐氏不得不簡單化個別理論內的差異，像是馬克思主義、新右派理論、實用論等不同理論內部的差異有時不亞於與其他理論間的差異，能否被歐氏簡單分類所涵蓋與討論不無疑問。

其次，歐門汀葛爾所稱的規劃理論其實僅局限於西方資本主義的規劃理論與經驗，更明確地說其實是在盎格魯薩克遜式的民主與自由的社會土壤中蘊生的，忽略了社會主義式(蘇聯、中國)或東方資本主義式(日本或東亞)不同地域的不同規劃經驗。而這些不同地方規劃經驗的差異(如果還無法說是理論的話)正是歐氏在書寫本書所提到的重要目的之一，誠然歐門汀葛爾注意到了英、美規劃理論與實務的差異，也在新右派理論、實用主義論以及倡導論等章節有精闢的比較與說明，像是比較新右派在英、美不同政治體制的實踐差異，或者比較倡導論在英、美地區有不同的專業組織形式，然對於英、美以外的規劃理論與實務卻未著墨。比如馬克思主義的規劃在蘇聯與中國即有不同的實踐路徑，但歐氏卻未對馬克思主義規劃實務的不同實踐進行分析。

第三，雖然歐門汀葛爾一開始曾經提到女性主義者對於規劃的啟發，但在後面陳述的規劃理論架構則有意地忽略性別對於規劃的影響。相較於歐氏從社區以及少數族裔的後現代主義反省與批判，性別的議題似乎是無足輕重的，關於性別的忽略似乎是做為一個男性、白人、中產階級的理論者通病，就如同哈柏瑪斯面對來自女性主義者佛蘭瑟(Fraser, 1993: 9)的攻訐，認為哈柏瑪斯的公共領域實則「布爾喬亞的男性主義者(bourgeois masculinist)」產物，忽略了被排除在公共領域之外的女性。或者是瑪西(Massey, 1994)點名批判索雅與哈維(David Harvey)，認為他們是白人、異性戀的中產階級男性後現代主義學者，剝除了身體的向度，呈現出性別歧視的觀點。女性主義者不僅從男/女性別二分的立場來質疑規劃制度與專業的性別不平等，也投身於後現代主義流動的性慾觀點來檢視以異性戀為主流的理論論述，轉而從身體的空間和感官經驗來討論空間，她們對於後現代主義理論家的批評可以用寶蒂一句名言來說明：「後現代主義可以視為白種西方男性的現代性危機經驗，以及面對這種危機經驗打轉的回應」(Bondi, 1990: 5，引自Soja, 1996: 121)。而這些女性主義對於規劃理論的啟發雖為歐氏所承認，但卻沒有回應(註2)。

最後，關於未來規劃理論的出路，歐氏描繪了三個不同的場景，一是繼續循著後現代主義來發展規劃

臺灣人文藝術期刊資料庫

理論，去除極端後現代論的片斷化與虛無主義，但保留後現代主義的元素，像敘事、規劃程序的開放性，鼓勵規劃者揭露與挑戰既有的權力關係，負擔更主動與創造性的角色；第二個場景是回到新的現代主義，像是合作論或者是溝通學派，而納入後現代主義開放性的批判；最後則是回歸到所謂的「再結構批判理論」，結合現代主義關心的民主議題與後現代社會理論的微觀政治學，回歸到後馬克思主義的批判，賦予行動者主動性與反身性，可以透過參與決策與行動來決定他們的未來。

雖然歐氏並未明確表達他個人對於這三個不同場景的價值判斷，不過從他採取的後實證主義立場，很明顯地比較站在「完成未竟的現代性計畫」立場來發言，這與歐氏同時是理論家兼實務工作者的雙重角色有關，他在強調規劃理論做為論述的重要性之餘，也不斷重申規劃理論在實務與社會實踐的可能性。儘管規劃的角色與國家之間仍有理不斷的共生共榮的情結，歐氏仍抱持著一個英式白人、男性菁英的樂觀主義，相信規劃理論不僅是不同時間、空間下開放性的論述創造，也是一套可以改變現況的行動方案。果真如此，在討論規劃理論時應思索加入第三世界的後殖民經驗論述，在溝通過程時要納入女性參與討論，在實務行動時則應考慮不同社區、地域與國家的差異，加入非西方的規劃理論與實務經驗。

註釋

註 1：歐門汀葛爾為英國亞柏丁大學(University of Aberdeen)土地經濟教授，目前是亞柏汀大學歐洲與區域研究中心的主任(Director of European and Regional Research Center, University of Aberdeen)，研究興趣在規劃理論與實務、公共參與。著有《後現代時期的規劃》(Planning in postmodern times, Routledge, 2001)等書。提倡後實驗主義的規劃理論，受到規劃學術界的重視與討論。

註 2：大多數的男性規劃理論學者都不願意回應來自女性主義者的攻擊，索雅是少數的例外，他在《第三空間》一書特別用了近十一頁(頁108-118)的篇幅來討論空間女性主義批判，標舉另外一位女性主義羅斯(Gillian Rose, 1993)的理論來回應地理學者瑪西(Massey, 1994)的攻擊。

參考文獻

邢幼田

1990 〈進步式規劃進步嗎？－國家體制內的進步規劃師〉《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95-111。

夏鑄九　王志弘編譯

1993 《空間的文化形式與社會理論讀本》台北：明文。

夏鑄九

1992 《理論建築》台北：唐山。

曾旭正

1990 〈規劃理論與社會變遷－七〇年代程序性規劃理論論戰的回顧〉《台灣社會研究季刊》3（1）：177-193。

Allmendinger, P.

2001 Planning in Postmodern Times. London: Routledge.

2002 Planning Theory, New York: Palgrave.

Bondi, L.

1990 “Gender Tourism in the Space Age : A Feminism Response to Postmodern Geography”, paper presented at the annual meeting of the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Geographers in Toronto.

Camhis, M.

1979 Planning Theory and Philosophy, London and New York: Tavistock Publications.

Castells, M.

1977 The Urban Question, Cambridge, Mass: MIT Press.

1983 The City and Grassroot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aludi, A.

1973a Planning Theory, Pergamon Press.

1973b A Reader in Planning Theory, Pergamon Press.

Fraser, N.

1990 “Rethinking in the public sphere, in Robbins”, in The Phantom Public Sphere 1-32. ed. Bruce, London: University of Minnesota Press,.

Forester, J.

1898 Planning in the Face of Power. London;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Friedmann, J.

1973 “The Public Interest and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toward a Reconstruction of Public Philosophy’,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 39（1）: 2-1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1987 Planning in the Public Domain: From Knowledge to Acti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Foucault, M.

1972 The Archaeology of Knowledge, 1rd. Sheridan Smith. New York : Pantheon Books.

Habermas, J.

1984 The Theory of Communication Action, Vol.1. Reason and the Rationalisation of Societ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Healey, P., McDougall, G. and Michael, J. T.

1982 Planning Theory, Pergamon Press.

1997 Collaborative Planning, Vancouver: UBC Press.

Hayek , F. A. von

1944 The Road to Serfdom. New York : Routledge

Krumholz

1975 "The Cleveland Policy Planning Report",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Institute of Planners, 41（5）:298-304.

Moore-Milroy, B.

1991 "Into Postmodern Weightless", Journal of Planning Education and Research, 10（3）:181-187.

Massey, D.

1994 "Flexible Sexism", in Space, Place and Gender. 212-248. ed. Massey, Doreen, Oxford: Polity Press,.

Rose, G.

1993 Feminism and Geography, Cambridge: Polity Press.

Soja, E. W.

1996 Thirdspace: Journeys to Los Angeles and Other Real-and-imagined Places, Blackwell Publishers.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